

爱国主义到底是什么

一种情感的发明、各国的答案、以及它的边界

王建硕

费曼式写法 ·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

导读

一种情感的发明、各国的答案、以及它的边界

先别急着表态

「你爱国吗？」

在大多数场合，这个问题是个表态题——标准答案现场就有，犹豫一秒都算事故。这本书想做的，是把它从表态题变成理解题：在你回答「爱不爱」之前，先弄清楚你爱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从哪来、为什么每个国家对它的态度差得那么远。**

先看一组反差，感受一下这个问题有多奇怪：

- 在美国，孩子每天对国旗宣誓效忠，而最高法院判决：拒绝宣誓是你的宪法权利——**不致敬的自由，被写进爱国主义的定义里。**
- 在德国，公开挥舞国旗曾经是需要心理建设的行为。这个国家给自己动了手术：不许爱「德意志民族」，只许爱一部宪法。
- 在日本，「爱国心」这个词被从教育法里删掉六十年又写回来，国旗国歌拖到 1999 年才有法律地位——为了一个「起立」，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 在芬兰、新加坡、以色列，爱国浓度全球最高，原因冷得像冰：小国输不起，输一次可能就没这个国家了。
- 而在中国，「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答案的一半——国和家写在同一个字里，三千年的图纸到今天还在运行。

同一个词，为什么在这些国家是加分项，在另一些国家是敏感词，在还有一些国家是命脉？

这本书的讲法

全书十二章，走一条线，分四段：

第一段（一至二章）拆零件。爱国情感的原料是几十万年进化出的群体本能；而「爱国主义」这套意识形态，是十八九世纪被急着打仗收税的现代国家**发明**出来的——义务兵役、义务教育、国歌国旗是三台制造机器。岳飞忠的不是今天意义的「国」，这个区别是理解一切的起点。

第二段（三至九章）看配方。同一个词，各国装进了完全不同的容器：美国忠于一张纸，法国靠一所小学锻造公民，德国带着烧伤换了插座，日本把词锁进柜子，中国在「家国同构」的老地基上盖新楼，小国把恐惧当燃料，瑞士和南斯拉夫演示了多民族拼装的两种结局——一个住了七百年的合租公寓，和一个烧成灰的。

第三段（十至十一章）划边界。用奥威尔的刀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三个互相顶替的词分开；再进社会心理学实验室，看塔吉菲尔用一支笔、谢里夫用一个夏令营，演示从健康自豪到危险狂热的五级滑坡。最后交付一份五条自检清单——这是全书最实用的一页。

第四段（十二章）往前看。气候、疫情、AI，人类第一次面对不认国界的存亡问题，而情感系统是为部落尺度设计的。尺寸错配怎么办？答案藏在那二十二个男孩拉卡车的绳子里。

两个事先声明

第一，这本书不评冠军。各国配方各有强项和暗坑，本书的工作是拆开给你看图纸，不是颁奖。凡是忍不住想替某国辩护或开骂的时刻，请想起第十一章的清单——那种冲动本身就是书里分析的对象。

第二，这本书不替你做结论。「我要不要爱国」是你的私人记忆和你的国家之间的私事。这本书只保证一件事：读完之后，你的那个情感——不管还在不在、变没变——都会变得更明白。

那就从一场足球解说的失态开始吧。

第一章·为谁心跳

一个足球解说员的失态

2006 年世界杯，意大利对澳大利亚。补时最后一分钟，意大利拿到点球。中央电视台的解说员黄健翔对着话筒喊出了那段后来被称作「解说门」的话：「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伟大的意大利的左后卫！」喊到最后几乎是嘶吼，还带着一句「澳大利亚队该回家了」。

事后他道歉、被停职。但有一个细节很少被讨论：黄健翔不是意大利人，那场比赛和他的工资、户口、人身安全毫无关系。一个中国解说员，为什么会为意大利队心跳加速、声音失控？

再问一层：世界杯看台上，几万人为一块绣着颜色的布尖叫、流泪、拥抱陌生人。那块布本身什么也做不了。这些人到底在激动什么？

这本书要拆的就是这件事。我们先不管它叫「爱国主义」还是别的什么，先问一个更朴素的问题：**这种「为自己人激动」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先忘掉国家，想想部落

国家只有几百年历史，但这种情感要古老得多。人类在几十万年里过着几十人到一百五十人的小群体生活——打猎、分肉、防野兽、防隔壁部落。在这样的环境里，「向着自家人」不是道德选择，是生存设置：一个完全不维护自己群体的人，基因很难传下来；一个群体里人人都只顾自己，这个群体很快就被更团结的群体灭掉。

心理学家给这种设置起了个名字，叫内群体偏爱——大白话就是：**只要是「我们」，就先多给三分好感；只要是「他们」，就先扣两分**。它不需要理由，甚至不需要真正的群体。第十一章会讲一个著名实验：把陌生人随机分成两组，发不同颜色的徽章，几分钟后两组人就开始互相歧视。分组理由是随机的，偏爱却是自动的。

大白话：你的大脑里装着一个几十万年前的操作系统，它的默认设置是「护短」。国家只是这个操作系统上最近才装的一个应用。

所以爱国情感的第一层原料，不是国家给的，是进化给的：一种对「自己人」的自动忠诚。问题在于——部落时代的「自己人」你都认识，一共一百来号。现代中国十四亿人，你一个都没见过的那十三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是怎么变成「自己人」的？

想象的共同体

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给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回答。他说，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注意，「想象的」不是说它假的、不存在，而是说：**这个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互相一辈子也见不到面，但每个人心里都装着「我们是一伙的」这幅画面。**

村子里的一百五十人不需要想象，天天见面，谁家几口人都知道。但你怎么「认识」一个漠河的渔民和一个三亚的潜水教练是同胞？靠的是一套传播装置：同一种语言的报纸和课本、每天早上同一时刻奏响的国歌、地图册上那只熟悉的轮廓、天气预报里「我国大部地区」。报纸尤其关键——安德森有个精彩的观察：每天早上，几百万人各自吃早餐时读同一份报纸，他们知道此刻有几百万人正在和自己做同一件事、关心同一件事。没有人组织这场仪式，但它每天把「我们」刷新一遍。

这个「想象」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安德森指出，它大到让人愿意为之去死——而且觉得死得有意义。没有哪种现代意识形态做到了这一点：很少有人愿意为「市场经济」牺牲，但为「祖国」牺牲的纪念碑立满全球。一种想象的联系，却调动了最真实的情感和最真实的生命。这正是它值得拆开研究的原因。

三个容易混淆的「自己人」

在往下走之前，先把三个经常被搅在一起的词分开，这本书后面全靠这三把尺子量东西：

- 族群认同：基于血缘、长相、祖先——「我们是一个种」。它的边界天生就画好了，你出生在里边还是外边，不由你选。

- 文化认同：基于语言、饮食、节日、记忆——「我们过一样的日子」。边界可以跨，但很慢，要一辈子去浸泡。
- 公民认同：基于制度和共同约定——「我们遵守同一部宪法、参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边界是法律画的，一张入籍纸就能跨过去。

为什么这个区分重要？因为各个国家对「爱国」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三者的配比分歧。第三章会看到，美国把宝几乎全押在公民认同上——所以一个刚入籍三十分钟的移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国家」；而德国历史上曾经把宝押在族群认同上，付出了人类史上最惨重的代价，然后彻底转向。第五章再讲它。

所以，爱国到底爱的是什麼？

现在可以给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一个初步答案了。当一个人说「我爱我的国家」，他体内其实在同时运转三样东西：

1. 一套几十万年前的群体忠诚本能（护短的操作系统）；
2. 一幅几百年内被报纸、学校、国歌搭建起来的想象图景（「我们」这个应用）；
3. 一份非常具体的私人记忆——家门口的河、小学课本的插图、某种食物的味道——这些真实的个人经验，被挂在了那个巨大的抽象概念上。

第三点常被忽略，但它解释了为什么爱国情感那么「真」：你爱的从来不是十四亿人这个抽象数字，你爱你真实吃过的、走过的、记住的那些碎片，而「国家」是这些碎片的总文件夹。抽象概念借用了具体记忆的温度。

大白话

大白话：爱国 = 古老的护短本能 × 现代的想法技术 × 你自己的私人记忆。三者缺一个，这个情感都点不着。

下一章的问题

如果这种情感的原料是古老的本能，那为什么「爱国主义」作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一套口号、一种义务，直到十八、十九世纪才出现？古代人就不爱国吗？罗马人为罗马死、岳飞为宋朝死，那算什么？

下一章会看到一个有点扫兴、但极其重要的事实：今天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发明**出来的——发明者是急着打仗和收税的现代国家，工具是义务兵役、义务教育和每天早上的升旗仪式。理解这个发明过程，是理解后面一切国家分歧的地基。

第二章 · 一项十九世纪的发明

岳飞爱国吗？

先处理上一章留下的问题。岳飞精忠报国，背上刺着字，这不算爱国算什么？

算忠君，也算了不起的个人品格——但它和今天说的「爱国主义」不是同一个东西。差别在哪？岳飞效忠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朝廷和一个具体的皇帝**：迎回二圣、收复失地，都是为了赵家的江山。整个体系里没有一个叫「民族」或「国民共同体」的抽象对象。孔子周游列国，谁的朝廷用他他就给谁干活，没人觉得他「叛国」——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国」这个忠诚的最终收件人。罗马人为罗马死，死的是「罗马公民」这个身份带来的荣誉和利益，同样没有「意大利民族」这回事。

这不是咬文嚼字。忠诚总得有个收件人。古代忠诚的收件人是君主、城邦、宗族——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爱国主义的收件人是一个抽象的「国家」，而这个收件人，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1793 年：一个走投无路的发明

制造过程有清楚的起点。1793 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国被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围攻，英军、普军、奥军、西军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国内还有叛乱。职业军队不够用了。8 月 23 日，国民公会颁布了一道史无前例的法令：全民皆兵（levée en masse）——大白话就是：**所有法国人，男的打仗，女的缝帐篷做绷带，孩子把旧布撕成绷带原料，老人负责到广场演讲鼓舞士气。整个国家全部动员起来。**

这道法令厉害的地方不在军事，在逻辑。以前的战争是国王的战争：国王雇佣军打，打输打赢和种地的人关系不大，谁当国王都是交税。但全民皆兵意味着国家公开宣布：**这场战争是你们每个人的事，因为这个国家是你们每个人的。**为了让人愿意去死，国家必须先发明一个值得为之死的「大家的国家」。结果法国真的顶住了，几年内动员了上百万士兵，把欧洲君主们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看到了这种新武器的威力：有爱国情感驱动军队，和雇佣军完全不是一个物种。

各国统治者立刻开始抄作业。现代爱国主义不是慢慢长出来的，是在战火的倒逼下被各国政府当成国防工程紧急上马的。

三台制造机器

这个工程主要靠三台机器，直到今天还在运转：

第一台：义务兵役。把全国二十岁上下的男青年从各自省份抽出来，混编在一起，说同一种官方语言，听同一套号令，为同一面旗站岗。普鲁士在 1806 年被拿破仑打得惨败之后，痛感法国式国民军队的威力，率先把普遍兵役和军队现代化捆在一起搞。兵役把「我是布列塔尼人」「我是普罗旺斯人」碾碎重铸成「我是法国人」。

第二台：义务教育。这台机器威力更大，因为它从六岁就开始运转。历史学家尤金·韦伯写过一本经典著作《把农民变成法国人》，记录了 1870 到 1914 年间法国农村的真实变化：在义务教育普及前，法国农民说几十种方言，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有人甚至把「祖国」（patrie）理解成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子。是乡村小学——免费的、强制的、说法语的小学——用识字课本、地图和升旗仪式，用了一代人时间，把农民变成了法国人。第四章会专门讲法国这台机器怎么运转。

第三台：符号系统。国歌、国旗、国庆、纪念碑。你可能以为这些东西古已有之，其实大多是十九世纪的速成产品：《马赛曲》1792 年写的，成了法国国歌；美国《星条旗》1931 年才正式定为国歌；遍布欧洲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几乎全部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符号的用法是**重复**：每天升旗、赛前奏国歌、年年国庆阅兵。情感这东西，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本能。

大白话

大白话：国家先需要一个「你愿意为它死」的理由，才发明了「爱国主义」这个理由。兵役制造身体，学校制造大脑，符号制造仪式。三班倒，全年无休。

发明了它，也被它反噬

这个故事有个讽刺的结尾。统治者发明爱国主义，本来是想让臣民更听话、更好动员。但「国家属于全体国民」这个逻辑一旦放出来，就收不回去了。人们很快顺着这个逻辑往下

推：既然国家是我们的，凭什么国王说了算？凭什么外国人统治我们？

于是爱国主义成了十九世纪所有革命和独立运动的发动机：希腊人从奥斯曼帝国独立、意大利统一、德意志统一、波兰人反复起义，用的都是同一套话术——「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国家」。统治者造出的武器，掉头对准了统治者自己。1918 年一战结束，奥匈、奥斯曼两大帝国解体，地图上冒出一堆按「民族」划线的新国家，就是这股力量冲到顶点的样子。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得很干脆：不是民族产生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制造了民族**。先有工程和机器，后有情感和群众。

所以，「制造」等于「虚假」吗？

讲到这里容易滑向一个结论：既然是发明的、制造的，那爱国主义就是洗脑，就是骗局。

这个结论下得太快。语言也是发明的，钱也是发明的，合同、权利、星期几——全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约定，但没有人能否认它们真实地组织了亿万人的生活，让人类的合作规模从一百五十人跳到了几亿人。问题从来不是「它是人造的」，而是「这个人造的东西被用来干什么、边界画在哪」。后面十章，基本就是在回答这后半句。

而且，各国造这台机器的图纸完全不同。有的国家把它造成一台「忠于制度」的机器，有的造成「忠于血缘」的机器，有的造了一半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拆了重建。从下一章开始，我们挨个拆开看。第一站，是把图纸设计得最特殊的那个国家：美国。

第三章·美国：忠于一面旗和一张纸

一个上午出生的国家

大多数国家是先有一群人，后有国家——法国人在「法国」这个词出现之前已经说了几百年法语。美国反过来了：1776 年先有一篇《独立宣言》宣告了一种理念，然后才慢慢长出配得上这个理念的人群。这不是修辞，是理解美国爱国主义的钥匙。

一个由移民拼起来的国家，没有共同的祖先，没有共同的宗教（宪法还禁止立国教），甚至连共同的母语都谈不上（开国时英语只是多数人的语言）。拿什么当黏合剂？美国给出的答案是：**忠于一套写在纸上的约定**。学者把这种形态叫公民爱国主义——大白话就是：你爱的不是「同文同种」，而是「同一份游戏规则」。

第一章说过，认同有三把尺子：族群、文化、公民。美国是把筹码几乎全押在第三把上的极端样本。押得有多彻底？看它的忠诚仪式就知道了。

每天早上的那 31 个词

很多美国公立学校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全体起立，右手放左胸，面朝国旗，念一段誓词：**「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在上帝之下、不可分割的国家，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31 个英文词，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念到高中毕业。

这段誓词的来历本身就是教科书级的「爱国主义制造案例」：它是 1892 年由一个叫弗朗西斯·贝拉米的编辑写的，背景是国家刚打完内战不到三十年、移民正潮水般涌入，社会焦虑「这些孩子到底算哪国人」。于是设计了这套每天重复的仪式，答案每天灌一遍。1954 年冷战正酣，国会又往誓词里加了「在上帝之下」四个字，用来和无神论的苏联划清界限——你看，连誓词都是随时按政治需要改写的。

更有意思的是围绕它的官司。1943 年，西弗吉尼亚州想强迫所有学生念誓词，耶和华见证人（一个因教义拒绝向任何旗帜致敬的教派）的孩子拒绝，被学校开除。案子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强迫致敬违宪**。法官杰克逊写下了一段被广泛引用的话，大意是：如果一

个国家连「不致敬的自由」都容不下，那它的致敬就一文不值。强迫爱国主义——在美国自己的宪法框架里——被认为是最不爱国的行为。这个细节后面讲德国和日本时还会回响。

宪法崇拜：对一张纸的深情

美国人表达爱国的方式里，有一件外人很难理解的事：他们对一份 1787 年的文件抱有近乎宗教的感情。宪法原件保存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防弹玻璃、恒温恒湿，展厅灯光特意调暗，参观者排队瞻仰，气氛接近教堂。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两百多年前的起草者「原意」是什么——这个争论的宗教色彩浓到法学家自己都调侃。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一个没有共同血缘的国家里，那张纸就是「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唯一书面凭证。爱美国，逻辑上就只能落实为「爱这套约定」。所以美国的爱国主义争论，几乎都围绕「谁更忠于那套约定」展开，而不是「谁更爱这片土地」。

这带来一个奇特景观：**在美国，批评政府可以是一种爱国表演**。1971 年五角大楼文件案、水门事件听证会、各种反战游行，参与者都宣称自己才是忠诚的一方——因为宪法把「批评政府的权利」写在了第一修正案里。入籍宣誓的誓词里，新公民承诺效忠的对象是「宪法和法律」，不是总统，不是领土，不是民族。

一面国旗引发的战争

当然，事情没那么干净。美国社会为「怎么才算爱国」打的架，一点也不比别国少。最典型的是国歌风波：2016 年，橄榄球运动员科林·卡佩尼克在赛前奏国歌时单膝跪地，抗议警察针对黑人的暴力。他说这恰恰是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是爱国；反对者（包括当时的总统特朗普）说这是对国旗和军人的侮辱，是不爱国，应该被开除。

注意双方吵的是什么：没有人否认「爱国」是好的，争的是**爱国的正确姿势**——是服从符号，还是践行符号背后的理念？这场争吵本身就是公民爱国主义的正常运转状态：因为忠诚的对象是一套理念，而理念永远可以被争论。卡佩尼克为此付出了职业生涯，但这个国家最高法院七十多年前就写好的判词站在他那一边。理念与符号打架时，美国宪法的答案是理念赢——至少在纸面上。

大白话：美国的爱国主义像一家创业公司——没有祖传家业（血缘、历史），只有一份创始协议（宪法）。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只能落实为对这份协议的忠诚，所以最激烈的忠诚表达反而是引用协议条款怼管理层。

硬币的另一面

这套设计不是没有代价。当一个人全押在理念上时，「不配享有这个理念的人」就会被排斥出去：1790 年的第一部入籍法规定只有「自由白人」可以入籍；1942 年，十二万日裔美国人——三分之二是美国出生的公民——被关进集中营，凭的不是他们做了什么，是他们的血统。理念爱国主义的纯度，历史上反复被族群冲动击穿。这个裂缝不是美国的例外，而是所有国家的常态，第十一章讨论狂热征候时还会回来。

另外，这种爱国主义有一个隐形的强度放大器：美国太强了。当你的国家是天下第一，「我们国家的方式」很容易膨胀成「人类唯一正确的方式」。第二章说的「发明爱国主义是为了动员」，在美国这里演化成了一个变体——美国例外论：大白话就是「我们不只是强，我们是特殊的、带着使命的」。这个词后面还会碰到它的各国亲戚。

下一站去欧洲大陆，看另一个极端：一个把爱国主义造得最精致、也最系统的国家——法国。美国靠一张纸，法国靠一所小学。

第四章 · 法国：共和国的孩子

一首小学课本里的歌

1880 年代，法国乡村小学的孩子唱着同一首识字歌上学。课本里有这样一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孩子，你生在法国，法国就是你的母亲。」这些课本的作者们有个明确的任务清单：让孩子说法语（而不是方言）、知道巴黎在哪、恨德国（1871 年刚被割走阿尔萨斯-洛林）、并且相信共和国是人间最好的制度。

这不是自发的民间教育，是一场由国家最高层策划的工程。1879 年共和党人终于稳住政权后，教育部长茹费里在 1881-82 年推出了著名的费里法案——大白话：小学教育**免费、强制、世俗化**，全国所有孩子必须上，由国家出钱，教会靠边站。历史学家后来给这套体制起了个绰号：「共和国的黑骑兵」——指的是几十万小学教师（hussards noirs，因穿黑色罩衫得名），像军队一样被派驻到每个村庄，任务是把农民的孩子锻造成共和国的公民。

第二章说过韦伯的研究：1870 年代很多法国农民不知道自己是法国人。四十年后，同一批人的子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为「法兰西」成百万地死去。中间隔着的就是这场教育工程。**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有完整记录的「爱国主义从无到有」的制造过程**——图纸、工期、验收结果全在档案里。

为什么是学校，而不是教堂

法国的爱国主义有一个美国没有的特征：它从一出生就是**反教会的**。原因要回到大革命：天主教会长期站在王权一边，而共和国的合法性恰恰建立在推翻王权之上。于是共和派认定，要让共和国活下去，就必须把教育从教会手里抢过来——孩子的心灵是两个制度争夺的主战场。

这场争夺在 1905 年达到顶点：法国通过政教分离法，确立了世俗主义（laïcité）——大白话：国家不给任何宗教站台，公立空间里宗教靠边。注意它和美式政教分离的微妙差别：美国是「保护宗教不受政府干预」，法国是「保护公共领域不受宗教影响」。方向正好相反。

这个差别至今还在制造新闻。2004 年法国禁止公立学校学生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头巾、大十字架、小帽），穆斯林头巾成为焦点。法国的辩护逻辑是：学校是锻造「共和国公民」的熔炉，进来就先把各自的宗教身份留在门外——先成为法国人，别的身份回家再说。批评者说这是对特定信仰群体的排斥。这场争论本质上是 1880 年代那台机器的运行逻辑在新时代的延续：**法国式爱国要求你先交出一部分「你」，换一张「共和国公民」的证。**

「我们的祖先高卢人」

那台机器锻造出来的认同长什么样？看课本里最著名的一句话：「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每个法国孩子都要学。这句话在 1880 年代是个精彩的发明——高卢人是罗马征服前就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选他们当祖先，既绕开了王室（法国大革命砍了国王的头，总不能认国王当祖宗），又强调了「我们自古以来就在这里」。

但它埋着一根刺，这根刺在二十世纪末发芽了：法国殖民地的孩子们——阿尔及利亚的、塞内加尔的、越南的——也被要求念「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一个在达喀尔念书、皮肤黝黑的非洲孩子，念着这句课文，是什么感受？二战后移民大量进入法国本土，这个荒诞感变成了真问题：如果「法国人」的入场券是一组特定的祖先和记忆，那移民的子孙永远差一张票。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夺冠，球队里齐达内（阿尔及利亚后裔）、图拉姆（瓜德罗普裔）这些名字占据头条，全法国欢呼「黑-白-阿拉伯」（black-blanc-beur）的多元法国。同一个国家队在 2010 年世界杯内讧罢训，舆论又立刻翻转为「这些移民后代根本不爱国」。高卢祖先的幽灵，至今在每场法国队比赛的看台和评论区游荡。

大白话

大白话：法国的配方是「学校 > 血缘」——理论上谁都可以被锻造成法国人；但锻造车间有个隐形门槛：你得愿意把别的身份先寄存。祖先高卢人的故事说明，再普世的配方里也藏着一张特定的脸。

这台机器有多成功？

成功到法国人自己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几个指标：法国大革命时全国只有约一半人口以法语为日常语言，到 1914 年方言基本退出学校和家庭，布列塔尼语、奥克语、巴斯克语被压

缩到角落——语言统一这个千年难题，四十年义务教育就解决了。法国人对「共和国价值观」的引用频率之高，在政治辩论里几乎成了标点符号：不管什么议题，最后都要问一句「这符合共和国价值吗」。

代价同样清晰：方言死了大半，地区认同被磨平，中央集权深入毛细血管。大革命后两百多年，法国仍然是欧洲最集权的大国之一——总统的权力大到让英美观察者咋舌。这不是巧合，是同一台机器的另一面：一个靠「统一思想」锻造出来的国家，天然倾向于把权力集中起来。

法国模式回答了「国家如何制造爱国」这个问题的极致版本：用教育，从六岁抓起，全国统一图纸。接下来要看的两个国家，都曾经把这套技术用向灾难的方向，然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反省。先看德国——一个被自己的爱国主义烧伤到近乎致命的国家。

第五章 · 德国：学会了不敢爱

一面消失又回来的旗

2006 年 6 月，世界杯在德国举办。开幕式上出现了让全世界记者愣住的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普通人挥舞着黑红金三色旗，脸上画着国旗色，在街头唱歌庆祝。德国媒体给它起了个名字：**「派对爱国主义」**（Party-Patriotismus）。

外人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世界杯嘛。但德国报纸的讨论语气像在做医学观察：「我们又可以了吗？」因为在之前整整六十年里，公开挥舞国旗在德国是一个需要心理建设的行为。一个柏林人回忆说，他父亲那辈人看到邻居挂国旗，第一反应是警惕：这人是不是极右翼？

为什么？因为德国是被爱国主义烧伤最严重的国家，伤口深到整个民族做了一次全世界罕见的手术：**主动给自己的爱国情感加上镣铐。**

烧伤的起点：当爱国变成唯一的词

德国的爱国主义曾经走了一条和法国相反的路。法国说「认同共和国，你就是法国人」——认同可以后天获得；德国浪漫派和后来的民族主义说「你是德意志人，因为你流着德意志的血、说德意志的语言、埋着德意志的祖先」——认同是天生注定的。第一章的三把尺子里，法国押公民认同，德国押的是**族群认同**。

这条路的逻辑终点出现在 1933-1945 年：如果民族由血缘定义，那么「净化」血缘就成了国家使命。纳粹的爱国话术从头到尾是「为德意志民族」，而它的实际产品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屠杀和一场把德国自己烧成废墟的战争。1945 年，德国一片瓦砾、被四国分区占领、在全世界面前名誉扫地——爱国主义这个牌子，在德国被砸得粉碎。

关键问题是：然后呢？一个两亿多人口的大国（分裂前），不能永远活在「我们以自己为耻」里。战后德国给出的答案，是人类政治史上一次极具创意的转身。

宪法爱国主义：爱一部法典

政治学者多尔夫·施特恩贝格尔在 1979 年造出了这个词，哲学家哈贝马斯在 1980 年代把它推到了公共舞台中央：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大白话：**德国人不爱「德意志民族」这个血缘共同体，改爱《基本法》（德国宪法）里写的那套价值：人的尊严、民主、法治。**爱国对象从「我们是谁」换成了「我们信奉什么」。

这个转身之所以深刻，在于它承认了一个多数国家不愿承认的事实：**历史里有些东西不能被「克服」，只能被永远记住。**德国的学校里，纳粹历史是必修课，中学生集体参观集中营遗址是常规行程；柏林市中心最显眼的位置，留给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两万平米的灰色石碑阵，就立在勃兰登堡门旁边，国家心脏地带。很少有国家把自己最大的罪行纪念馆放在首都正中心。1970 年，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突然跪下——一国总理跪的是别国领土上、被本国杀害的受害者。这一跪没有写在任何法律里，但它定义了之后五十年德国爱国情感的姿势：**以记忆为地基，而不是以遗忘为地基。**

效果直接反映在态度数据里。战后几十年，各种民调里德国人的「为国自豪」都是欧洲最低之一。社会学家观察到德国人谈起爱国时的典型表情：犹豫、找词、先声明「我不是民族主义」。这在别的国家会被看作冷漠，在德国是被训练出来的谨慎——一种把「自豪」和「警惕」焊在一起的情感结构。

2006：一次小心翼翼的解冻

所以才能理解 2006 年世界杯为什么在德国是件大事。那是战后第一次，普通德国人——不是极右翼、不是官方仪式，就是普通球迷——大规模地、兴高采烈地挥国旗，而且没出事。没有排外骚乱跟着发生，狂欢就是狂欢。社论松了一口气：也许我们可以「正常的自豪」了，像一个没烧伤过的人那样。

但镣铐没有完全摘掉，德国人也没打算摘。几个迹象：德国的极右翼政党试图回收国旗和「爱国」话语时，主流政党和媒体的反应仍然是高度警觉的联合围剿；德国至今没有美国式的效忠誓词，学校不升旗；德国人表达自豪的安全方式是「我们足球踢得好」「我们的制造业靠谱」「我们按时付款」——自豪被引导向**具体的成就**，而不是抽象的「民族伟大」。

大白话：德国模式 = 爱国情感保留，但换了插座——从「血缘」的插座拔下来，插到「宪法价值」上；同时装了一个永不关闭的漏电保护器：对民族自豪的条件反射式警惕。

德国实验说明了什么

德国案例在这本书里极其重要，因为它证明了两件事：

第一，**爱国主义的形态是可以被国家主动选择的**，不是命中注定。同一个民族，1871 年选择了族群式的，酿成灾难；1949 年后换成宪法式的，运转至今。第一章说认同的配方是三把尺子的配比——德国是前后两次配方对比的完整实验记录。

第二，**代价是真实的**。宪法爱国主义运行良好，但它建立在持续的心理消耗上：一个永远背着罪责记忆的民族，自豪感先天发育不良。2006 年那些挥旗的年轻人，很大程度上是没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在试探边界。爱国主义在德国至今是一个「康复中」的器官，不是痊愈的器官。

往东看，另一个战败国做了几乎相反的选择——不是给爱国情感加镣铐，而是绕着它走，绕着绕着，这个词本身成了禁区。下一站，日本。

第六章 · 日本：一个词引起的争吵

一个说不出口的词

日语里有个词：爱国心 (aikokushin)，就是「爱国心」。在今天的日本，这个词在公共场合的使用方式很特别——人们说的时候往往要带一点铺垫、一点歉意，或者干脆用引号。政治家如果反复强调它，会被媒体追问：你说的「爱国」是哪种爱国？

对比一下：美国政客把 patriotism 挂在嘴边是加分项，法国政客引用「共和国价值」是标点符号，而日本政客说「爱国心」是要先做风险测评的。同样是二战战败国，德国把爱国情感做了换插座手术，日本的处理方式更像另一种：**把这个词整个放进柜子，尽量不去碰它。**

为什么会这样？要从一部法律的两次写法说起。

一部法律的两写法

1947 年，美军占领下的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取代战前的《教育敕语》。战前那份敕语里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扶翼皇运」的忠良臣民——大白话：好孩子 = 忠于天皇的好臣民。1947 年的新法把这一套整个删掉，教育目标改成了「建设民主的、文化的国家」。注意它**没有写**「培养爱国心」——不是漏了，是刻意的。占领军和日本的改革者共同的判断是：战前的「爱国」教育是把国家送进战争的传送带，这条传送带必须拆掉。

这部法律运行了六十年。然后 2006 年，安倍内阁推动修改《教育基本法》，把「培养爱国心」正式写了回去——准确措辞是培养「尊重传统与文化、热爱孕育它们的祖国和乡土」的态度。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在法律文本里重新出现「爱国」的表述。国会吵翻了天，反对者的逻辑一句话就能说清：**这个传送带我们亲眼见过它通向哪里。**支持者的逻辑也一句话：一个连「爱自己国家」都不敢写进教育法的国家，不正常。2006 年 12 月，修正案通过。

注意这场争吵的结构：双方都认为「爱国」是个重要的东西——重要到一方坚持要写进去，另一方坚持不能写。一个词的分量，是由它背后的历史记忆称出来的。

一面旗和一首歌的诉讼史

这种「绕着走」在国旗国歌问题上表现得最淋漓尽致。《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在战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法律地位——全世界主要国家里几乎没有第二家：用了上百年的国旗国歌，法律上「查无此旗」。为什么？因为它们和战时记忆绑得太紧：《君之代》的歌词是「君主的统治绵延千代」，战前每天在学校和军营里奏响；战后给它们立法地位，等于官方给那段记忆翻案，国会不敢碰。

僵局一直拖到 1999 年才被一个悲剧打破。广岛一所高中的校长夹在教委（要求毕业典礼必须升日之丸、奏君之代）和教师工会（抵制）之间，两边都得罪不起，最后自杀身亡。震动之下，国会当年通过了《国旗国歌法》，《日之丸》和《君之代》终于获得正式地位——距离日本投降已经五十四年。

但故事没完。法律通过后，东京都教委要求公立学校典礼上教师必须起立齐唱，拒不起立的教师被处分，教师们一路告到最高法院。2011-2012 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微妙：认定命令合宪，但处分要克制——翻译过来：**国家可以要求，但不能强按头**。一场关于「起立」的官司打了十几年，这本身就是「爱国」这个词在日本社会敏感度的测量仪。

民间的温度计

官方层面小心翼翼，民间呢？数据会说话：各国民调里问「你是否愿意为国家而战」，日本常年垫底——2015 年一项多国调查里只有约 11% 的日本人回答愿意，在受调查国家里最低。问「你对自己的国家自豪吗」，日本的比例也低于绝大多数邻国。

但别急着说日本人不爱国。日本人表达「爱」的方式换了赛道：对「日本的东西」的深厚感情——铁路的准时、街道的干净、职人的手艺、四季的仪式感——这种文化自信极强，强到外国游客都能感觉到。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后，避难所里排队领物资、无人哄抢的画面震惊世界，那种秩序感的底层就是一种「我们日本人」的共同默契。大白话：**政治意义上的爱国被冷冻了，但第一章说的那种群体认同本能没有消失，它改道流进了文化和生活细节里。**

大白话：德国和日本都是被烧伤的人。德国选择「记住伤口，带着它正常生活」；日本选择「尽量不提伤口，把感情转移到别处」。两条路都避免了复发，但德国那个器官在康复训练，日本那个器官被闲置了——闲置的器官哪天被谁重新启用、用来干什么，是个悬着的问题。

悬着的问题

这个悬着的问题在 2010 年代越来越具体：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条款）的争论、防卫费的上涨、「普通国家化」的讨论，都在重新激活那个柜子里的词。支持者说要「健康的爱国主义」，反对者说你们要的恰恰是 1947 年被拆掉的那条传送带。争论本身没有结论——但它证明了第一章的框架：爱国情感是台机器，机器的图纸可以随时被重新画，而画图的人永远声称自己吸取了教训。

看完两个战败国的自我手术，轮到这本书最重要的对照组了：一个有着三千年连续家国记忆、且「国家」这个词本身就写着答案的地方——中国。

第七章·中国：家国同构

一个自带答案的词

先看一个天天在用、却很少被注意的事实：中文里「国家」这个词，是「国」和「家」两个字拼起来的。英语里 country、nation、state 三个词各有各的词根，和「家」（family、home）毫无关系；而中文把「国」直接构造成「家」的放大版。

这不是巧合，是结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底层图纸叫家国同构——大白话：**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同一套伦理管到底**。家里讲孝，国里讲忠，忠和孝是同一种情感的两种剂量。《大学》里那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条完整的传送带：把自己修好，把家管好，然后自然延伸到治国平天下。皇帝叫「君父」，官员叫「父母官」，老百姓叫「子民」——整套政治词汇都是家庭词汇的借用。

理解了这张图纸，才能理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殊性：它在三千年里都不是「忠于一个抽象共同体」，而是**忠于一个放大的家庭秩序**。这带来一个和欧美完全不同的情感质地——后面会看到。

从「忠君」到「爱国」：一次被迫的升级

第二章说过，古代忠诚的收件人是君主，不是「国家」。这个系统在中国运转得极其顺滑——一直到它撞上了现代世界。1895 年甲午战败，败给的不是西洋列强，是千百年来被看作学生的日本，中国精英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梁启超那代人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问题：战场上日本士兵喊着「为国」冲锋，而中国这边的士兵多数连自己是「中国人」都说不清，只知道给皇帝当差。**对手已经装上了「国民国家」这个新操作系统，自己还在跑「王朝」的旧系统。**

于是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概念移植。梁启超从日语里引进了「国民」「民族」「爱国」这一整套词汇（这些词大多是日本人先用汉字翻译西方概念造出来的），写出《少年中国说》，疾呼中国要从「朝廷」变成「国家」。注意这里有个历史细节：「爱国」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本身就是学习对手的结果。1919 年五四运动，学生们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现代意义的

爱国主义——忠于「中华民族」这个抽象共同体，而不是爱新觉罗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甲午到五四，中国用了二十四年完成忠诚收件人的切换。

这个「被迫升级」的出身，给中国爱国主义刻下了一个至今清晰的底色：救亡图存——大白话：爱国的核心动机是「不能再挨打」。对比一下：美国爱国主义的底色是「我们创立了一个好理念」，法国是「我们代表一种普世价值」，而中国是「我们曾经差点亡国」。底色不同，情感的触发点就不同——后面会看到，「落后就要挨打」「勿忘国耻」这类话语的动员力，全部来自这个底色。

今天的配方

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套完整的国家工程，规模在全球少见。几个有形的部件：

- **教育。**从 1994 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开始，爱国主义被系统写进大中小学课程；2024 年《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施行，把它从政策升级为法律。历史课本的叙事主线是「百年屈辱—奋斗—复兴」，这是救亡图存底色的制度化版本。
- **基地。**全国数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从圆明园遗址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把抽象历史变成可以走进、看得见的空间。这个做法的聪明之处符合第一章的原理：抽象概念要借用具体记忆的温度，遗址就是最直接的温度来源。
- **仪式。**升旗、入队入团入党宣誓、国庆阅兵。2019 年国庆七十周年阅兵的电视直播收视和社交媒体讨论量，显示这套仪式的情感动员力仍然巨大。

官方话语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自我修正机制：理性爱国。2012 年反日游行中出现打砸日系车、伤人事件后，官方和媒体反复强调爱国要「理性」「守法」，不能把同胞的财产当成泄愤对象。这等于公开承认了一个边界问题：**爱国情感是高性能燃料，没有燃烧室就会烧穿发动机**。第十一章会专门拆这个燃烧室的结构。

家国同构的现代回声

回到开头那张图纸。家国同构这个三千年前的结构，今天还在运行，只是换了表达方式。

「国家」这个词还在用；春晚小品里「小家—大家—国家」的叙事链条年年出现；汶川地震、疫情这类危机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员逻辑本质上还是家庭逻辑——自家人有难，不分彼此。

这个结构有个独特的情感效果，是欧美模式没有的：在中国，爱国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通道特别短。因为「国」被构造成「家」的放大版，侮辱国家约等于侮辱家人——这解释了为什么涉及主权、领土的话题（台湾、南海、地图）在中国舆论场的情感温度极高，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用的是保卫家产的语言。第一章说认同有三把尺子，中国的配方是把**文化认同（三千年连续的共同记忆）和族群认同（炎黄子孙的血缘叙事）编织在一起**，再在上面叠一个现代公民国家——三层都有，配比和欧美完全不同。

大白话

大白话：中国的爱国主义是用最老的材料（家的伦理）造的最新的机器（现代国家）。老材料让这台机器的情感马力特别大；新机器意味着它的操作系统（主权、宪法、国际法）又必须和全世界通用。两套系统的磨合，就是当代中国爱国叙事里所有张力的来源。

一个对照实验的预告

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看，对比极其干净：美国是先有理念（独立宣言）后有人民，所以爱国=忠于纸上的约定；中国是先有绵延三千年的「家—国」连续体，后有现代国家，所以爱国=保卫放大的家。一个是创业公司，一个是百年老店。两种配方各有强项和暗坑，没有标准答案——这正是这本书的立场：把各国的配方拆开看，而不是评出一个冠军。

大国看完了。接下来看另一类玩家：那些地方小、邻居凶、输不起的国家。它们的爱国主义浓度普遍最高——不是因为更浪漫，是因为输一次可能就没了。下一站，小国。

第八章·小国求生：爱国作为生存技术

一场本该一周结束的战争

1939 年 11 月 30 日，苏联红军越过芬兰边境。兵力对比是教科书级的悬殊：苏联投入约一百万兵力、三千辆坦克；芬兰全国人口三百七十万，能动员的部队约三十万，坦克几十辆。苏军将领预估两周内打到赫尔辛基。

结果这场冬季战争打了一百零五天。芬兰滑雪部队穿着白色伪装服在零下四十度的森林里神出鬼没，一个被反复讲述的战术叫「柴堆战法」(motti)——把苏军纵队切成一段段，围在雪地里各个击破。最终苏联惨胜，芬兰割让了约 11% 的领土，但**保住了独立**。作为对照：同一时期，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被苏联整个吞并，消失了五十年。

芬兰人给这场战争的精神内核起了个词：西苏 (sisu)——这个词没法精确翻译，大意是「明知打不过也不松手的那种狠劲」。它不写在宪法里，不挂在墙上，但每个芬兰人都知道它是什么。这个词至今是芬兰国民认同的核心——一个从战争废墟里提炼出来的词，成了这个国家的精神商标。

为什么是小国最浓

先看一个常被忽略的规律：全球范围看，爱国主义浓度和国土规模往往成反比。瑞士、芬兰、以色列、新加坡、韩国，这些国家的国民服役率、国旗使用率、「为国而战」意愿，普遍高于大国。为什么？

答案冷得像芬兰的冬天：**因为小国输不起**。大国战败一次，割地赔款，国家还在；小国战败一次，可能就从地图上消失。第二章说爱国主义是被发明出来的国防工程——对大国它是工程，对小国它是命脉。爱国情感的浓度，本质上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生存焦虑浓度**。

新加坡把这一点说得最直白。1965 年被马来西亚联邦「请出去」、被迫独立时，李光耀在电视直播里哭了——那不是演的：一个六百多平方公里、没有淡水（当时供水靠马来西亚）、没有军队、夹在两个大邻国之间的城市国家，破产风险是真实的。新加坡的应对是把生存焦

虑制度化：1967 年推出全民男兵役（国民服役），每个男性公民服役两年、之后做二十年战备军人；1984 年设立「全面防卫」日，每年 2 月 15 日——选这一天因为那是 1942 年英军向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的日子，全国学校每年重温一遍「我们为什么会亡国」。用战败纪念日当全民教育日，这是把生存焦虑写进日历的操作。

以色列则是另一个极端样本：1948 年建国当天就被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军进攻，之后七十年里打了多场生存之战。它的制度设计是全民兵役——包括女性，这在全世界都罕见——以及一套深入日常的「围城心态」教育。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核心信息被反复浓缩为一句话：**「再也不会了」(Never Again)**。和新加坡一样，爱国教育的中心展品是本民族最惨痛的记忆。

焦虑配方的副作用

看到这里，小国的配方已经很清楚了：**拿最深的恐惧当燃料，烧出最高的团结**。这套配方极其有效——芬兰守住了独立，新加坡从沼泽地建成金融中心，以色列在强敌环伺中活了下来。但它有清晰的副作用，小国的政治家们自己也知道：

- **例外主义倾向**。「我们随时可能亡国」很容易推导出「常规规则对我们不适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新加坡对言论和集会的严格管制，背后都是同一句话：我们输不起，所以没资格奢侈。这句话有真实的依据，也可以被无限滥用——第十一章讨论狂热征候时会回来。
- **情感的代际衰减**。没见过亡国的年轻人，对祖辈的恐惧无感。新加坡教育部每年都在升级国民教育课程，和「年轻人觉得这都是老黄历」作斗争。恐惧驱动的爱国主义有一个内置保质期：恐惧必须被不断重演，否则就会褪色。这就是为什么纪念馆、纪念日、军训都要年年重复。

大白话

大白话：小国的爱国主义是高压锅——生存压力越大，锅内压力越高，做饭越快（团结、动员、纪律惊人），但排气阀必须一直看着，而且锅不能停火，一停火压力就泄了。大国的爱国主义是慢炖锅，压力小，容错大，可以慢慢聊理念。

留给下一章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的国家——不管大国小国——内部都比较「匀」：芬兰人基本都认同自己是芬兰人，日本人的认同分歧不大。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麻烦恰恰在于内部不匀：一个壳里装着好几个民族、好几种语言，「我们」到底指谁？有的国家拼了几百年拼成了一个模范生，有的国家拼了几十年，在九十年代当着全世界的面散架，散得血流成河。下一站：拼装的艺术与灾难。

第九章·散装的国家：认同怎么拼装

一个不存在「瑞士人」的国家

先做个思想实验：瑞士人说什么语言？

答案是：看哪个瑞士人。这个国家八百多万人口，官方语言有四种——德语（约六成人口）、法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一个日内瓦的瑞士人和一个苏黎世的瑞士人，聊天很可能要用英语，因为彼此的母语互相听不懂。没有「瑞士语」，没有单一的瑞士民族，宗教上天主教和新教各半，历史上还打过内战（1847 年，分离主义联盟战争，七个天主教州对抗联邦）。

按第一章的三把尺子，瑞士在族群、文化两条上都散装到了极点。可它是全世界国家认同最稳固的地方之一——「我是瑞士人」这句话，日内瓦人和苏黎世人说得一样理直气壮。瑞士人自己有个词概括这件事：意志国家（Willensnation）——大白话：**把我们粘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和语言，是「我们愿意在一起」这个共同决定本身。**

这个「愿意」不是一句鸡汤，是一整套让它每天兑现的制度：极度联邦制（二十六个州，各州财政教育警察大权在握，联邦政府弱得让外国观察家吃惊）、直接民主（每年好几次全民公投，公民对具体议题直接投票）、军队是民兵制（适龄男性定期集训，家里的柜子里放着军服）。翻译成成人话：**没有哪个群体能独占这个国家，所以每个群体都不必害怕这个国家。**德语区占六成人口，但它没有、也不能把瑞士变成「德意志人的国家」——制度上就没留这个门。

对照组：一个散架的拼装品

再看南斯拉夫。1945 年铁托重建的这个国家，装着六个共和国、两大宗教（东正教、天主教，加上后来凸显的伊斯兰教）、两种字母（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铁托的方案叫「兄弟情谊与团结」——用一个强人加上「南斯拉夫人」这个超越各民族的顶层认同，把各民族按住。官方不承认任何民族的主导地位，国歌、货币、军队都刻意用「南斯拉夫」而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名字。

这个拼装品看起来运转了三十五年。但 1980 年铁托一死，问题的原形露出来了：**「南斯拉夫人」这个认同，从来没在普通人心里真正扎根——它是铁托个人威望的附属品。**人一走，茶就凉。更致命的是制度设计：各共和国的边界基本按民族划，每个共和国有自己的党政班子——等于把散伙的分割线预先画好了，连拆伙的工具都备齐了。

1991 年起，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相继宣布独立，战争随之而来。波黑战争（1992-95）死了约十万人，斯雷布雷尼察一地就有八千多名穆斯林男性被系统性屠杀——种族清洗这个词重新回到了欧洲。一个号称「兄弟情谊与团结」的国家，最终以兄弟互相屠杀收场。

同样是散装，为什么结局相反

把瑞士和南斯拉夫并排放，差异不在「有没有民族矛盾」——两边都有，瑞士 1847 年还真刀真枪打过内战。差异在三个地方：

第一，拼装的时间深度。瑞士的联邦实验从 1291 年三个山谷的盟约开始，磨合了七百年，中间经过多次内战和重修，认同是一层层长出来的。南斯拉夫是 1918 年和 1945 年两次用图纸速成拼出来的，顶层认同只有一代人的厚度。第二章说爱国主义是被发明的——发明出来的东西需要时间去「盘」，盘出包浆才算数。

第二，「谁的国家」这个问题有没有被锁死。瑞士用制度把答案锁死为「谁都不是，所以是大家的」。南斯拉夫锁死这个答案靠的是铁托个人——强人一死，锁就没了，「这是谁的国家」立刻变成可以争夺的问题。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回答是「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人的回答是「克罗地亚人的」——争夺「谁的国家」的战争，就是最血腥的战争。

第三，散伙的台阶有没有预留。瑞士的州想获得更多的自治权，走公投和修宪的慢车道，没有动武的动机——因为和平渠道真的能走通。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宪法里甚至写了「脱离权」，但这个权利没有任何可操作的和平程序，唯一的兑现方式就是战争。**制度不给和平的出路，人就会走暴力的出路。**

大白话：多民族国家像合租公寓。瑞士的办法是把合租规则写细写死，水电煤怎么摊、谁都不能把客厅改成自己卧室，于是能住七百年。南斯拉夫的办法是请一个威望最高的室友镇场子，他住院那天，所有人开始抢房间，最后把房子烧了。

这一章真正想说的

拼装问题不只是瑞士和南斯拉夫的问题。苏联 1991 年散成十五块、捷克斯洛伐克 1993 年和平分手（「天鹅绒离婚」，证明和平分手是可能的）、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英国的苏格兰、加拿大的魁北克——「这是谁的国家」是大多数国家衣柜里的骷髅。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巨型国家，本质上也在持续做拼装工程，第七章说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就是中国版的答卷。

散装国家的案例给全书提供了一个关键洞察：**爱国情感本身是中性的原料，决定结局的是它被装进什么制度容器。**容器是「谁都不是主人」的制度，原料产出稳定；容器是「谁的拳头硬谁当主人」，原料就是炸药。这个洞察会直接支撑第十一章的判断框架。

不过在下结论之前，还差一件工具：我们一直混用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这几个词。它们在大众话语里经常互相顶替、互相伪装，是时候把三个词摆上桌，划出边界了。下一章，做一次概念的清仓。

第十章 · 三个词的边界

三个在饭桌上互相顶替的词

任何一场关于「爱国」的争论，进行到第三分钟，几乎必然出现这个词义混乱：一个人说「我是爱国，不是民族主义」，另一个人说「你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第三个人说「你们都是老古董，我是世界公民」。三个人都觉得自己在讲道理，其实他们连在说哪个词都没对齐。

这一章做一次清仓，把三个词的边界划出来。划界的依据不是字典，是这三个词**各自回答的问题不一样**。

爱国主义：回答「你对谁有感情」

1945 年，二战刚结束，乔治·奥威尔写了一篇叫《民族主义札记》的短文，开头就给了一个至今最好用的区分：

爱国主义，是对一个地方和一种生活方式的依恋。它的本质是防守性的——爱我熟悉的街道、食物、语言、人群，愿意保护它们，但没有兴趣强迫别人也过这种生活。奥威尔的原文说，爱国主义「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文化上都是防御性的」。

用这本书前面九章的话说：爱国主义是第一章那个古老情感的正常态——护短本能 + 想象共同体 + 私人记忆，指向自己的家园。它不必然包含「我们比别人强」，更不必然包含「别人该归我们管」。一个瑞士人、一个芬兰人、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爱国情感，主体都是这个。

民族主义：回答「谁该赢」

奥威尔接着定义了另一个东西。民族主义——按他的用法——是把「我们」识别为**优越的**，并且把国家的声望和权力当作情感的中心：**它的本质是争胜，是比较，是权力欲穿上了民族的外衣**。关键不在「爱我们」，而在「必须赢过他们」。一个民族主义者最深的痛苦不是自己的国家受苦，而是自己的国家被轻视；最深的快乐不是自己的国家进步，而是对手出丑。

奥威尔有一个极其锋利的观察：民族主义者是不在乎事实的，他们只在乎「有利于我方」——同一件事，我方做是英勇，敌方做是残暴；我方输了是阴谋，敌方输了是活该。而且他

指出一个反直觉的点：**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往往可以为任何民族服务**——今天为斯大林，明天可以为反斯大林，忠诚的对象可以换，「必须站在胜利者一边、必须压倒某一方」的心理结构不变。这个洞察解释了为什么极端话术在各国互联网上长得一模一样：结构相同，只是贴的国旗不同。

用这个区分回看前面的章节，很多谜题自动解开：卡佩尼克之争（第三章）其实是爱国主义内部的争论，但双方都指责对方「不爱国」；德国（第五章）拼命要保卫的正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隔离带；小国的例外主义（第八章）是防守型情感向争胜型滑动时最容易踩的斜坡。

大白话

大白话：爱国主义是「我家很好，我爱我家」；民族主义是「我家必须赢，你家最好输」。前者不需要敌人也能成立，后者没有敌人就无法运转——这就是为什么判断一个人说的是哪种，最简单的方法是看他的快乐来源：是「我们变好了」，还是「他们倒霉了」。

世界主义：回答「边界有多重要」

第三个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源头非常早：公元前四世纪，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被问「你是哪里人」，他回答：**「我是世界公民」（kosmopolitês）**——这个词是他造的，字面意思「宇宙城邦的居民」。它的核心主张是：人首先属于人类这个共同体，国界是人为的、次要的。

这个立场在二十世纪末迎来一次大复兴。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 1994 年发表《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主张教育应该培养孩子的首要认同是「人类」，因为重大道德问题（贫困、环境、正义）都不按国界分布。文章引来几十位学者围攻，其中最有力的反驳来自她自己也尊重的方向：**爱是有梯度、有结构的东西，不是平均分配的**。你对家人的责任天然重于陌生人，这不是道德缺陷，是道德的运行方式；一个对父母和路人一视同仁的人，不是更道德，是更冷漠。此外，「人类」这个共同体没有学校、没有军队、没有纪念馆——第二章讲过，认同是要靠机器维护的，「世界公民」这台机器至今没人造出来，所以它往往停留在精英的自我描述，而不是群众的真实情感。

但世界主义有一个无法驳回的诘问，全书必须正视：气候变化、疫情、核扩散、AI 风险——这些真正的存亡议题全部跨越国界，而「爱国」的情感结构天然只管界内。这是第十二章的

主角。

一个词义坐标系

现在可以把三个词放进同一个坐标系了。横轴是「我的共同体的边界画多大」，纵轴是「我对界外的态度」：

- **爱国主义**：边界画在国家，对界外的态度是中性偏友好——「各爱各家」。
- **民族主义**（奥威尔义）：边界画在国家，对界外的态度是争胜与敌意——「我家必须赢」。
- **世界主义**：边界画在全人类，拒绝承认小边界在道德上的优先地位。

还有必要记住塞缪尔·约翰逊 1775 年那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注意，他骂的不是爱国情感本身——上下文显示他骂的是**拿爱国当挡箭牌的人**。这句话之所以能流传两百五十年，是因为每一代人都反复见到它被验证：一个人没什么可辩护的了，最后就会举旗。判断话术的标准因此可以再加一条：当一个人把「爱国」作为**论证的终点**（「因为这是爱国，所以别问了」）而不是论证的起点，约翰逊的警报就该响了。

词划清了。但划清词只是地图工作，真正的问题是 terrain：从健康的自豪到危险的狂热，中间那片滑坡长什么样？心理学恰好做过最干净的实验。下一章，进实验室。

第十一章 · 从自豪到狂热有多远

一支笔就够了

1970 年代初，布里斯托尔大学，心理学家亨利·塔吉菲尔做了一系列后来被引用到泛滥的实验。招募一批十四五岁的男孩，给他们看抽象画，问他们更喜欢克利还是康定斯基——其实画是幌子，分组是随机的。然后告诉男孩们：「你属于克利组」或者「你属于康定斯基组」。接下来让他们做一件看似无关的事：给别的男孩分配小钱。

结果让研究者自己都吃惊：男孩们系统性地偏袒「自己组」的人——哪怕这个组是五分钟前按一个虚构标准随便分的，哪怕组员互不认识，哪怕偏袒自己组**对自己毫无好处**（钱是分配给别人的）。更微妙的发现是：很多男孩宁愿选择「自己组得 7 分、对方组得 1 分」，也不选「自己组 12 分、对方组得 11 分」——**他们宁可自己人拿得少，也要拉开和对方的差距。**

这就是著名的最简群体范式——大白话：制造「我们 vs 他们」，不需要历史、不需要血缘、不需要利益冲突，**一支笔随便画条线就够了**。第一章说的那个古老操作系统，在这个实验里露出了源代码：内群体偏爱默认开启的，打开它的按钮小得可笑。

罗伯斯洞穴：从露营到战争只要三周

如果最简群体实验展示了「点火有多容易」，1954 年谢里夫的罗伯斯洞穴实验展示了「烧起来有多快」。研究者把二十二个十一岁的普通男孩（经过筛选，全部是心理健康、背景相似的孩子）带到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州立公园夏令营，分成两组，两组最初互相不知道对方存在。

第一周，各组自己活动：爬山、游泳、做饭。两组各自迅速产生了名字和认同——「响尾蛇队」和「鹰队」，各自做了队旗，定了规矩。第二周，安排两组见面并比赛：棒球、拔河，设奖品。几天之内，友谊赛的性质彻底变了：烧对方队旗、偷对方财物、互相起侮辱性外号，「响尾蛇队」的孩子们开始随身携带袜子装的石块当武器，研究者不得不介入防止群殴。从陌生人到准战争状态，三周。

然后是最有希望的第三周：研究者设计了只有两组合作才能解决的危机——营地供水断了，要所有人一起排查；运食物的卡车陷住了，要所有人一起拉那根拔河绳（对，就是上一周用来互相仇恨的那根绳子）。几次合作之后，敌意肉眼可见地消退，孩子们开始混坐、互相请客。烧起来的火，用「共同的更大目标」可以浇灭。这一条请记住，第十二章要用。

滑坡的五个台阶

把这两个实验和前面十章的真实案例叠在一起，可以画出从健康自豪到危险狂热的滑坡——它不是悬崖，是台阶，每一级都舒服得像平地：

1. **第一级：偏爱。**给自己人多三分好感。塔吉菲尔证明这是出厂设置，无害，甚至可爱——支持家乡球队就是这个。
2. **第二级：比较。**「我们」的好需要靠「他们」的差来确认。实验里男孩们宁可少得也要拉开差距，就是这一级。爱国话术里出现「看看人家都乱成什么样了」，就是在爬这一级。
3. **第三级：免责。**我方的错误开始被自动豁免。同一行为，我方做是「不得已」，对方做是「本性恶」——奥威尔说的民族主义者的双重标准，在这里制度化。
4. **第四级：忠诚审查。**对「自己人」的要求从「一起做事」升级为「表态站队」。批评被等同于背叛——罗伯斯洞穴里哪个男孩跟对方组的人说话，就会被自己组孤立。第三章说过，美国最高法院 1943 年专门判过：强迫表态是爱国的反面。一个国家开始惩罚「不够爱国」的公民时，已经在这一级了。
5. **第五级：非人化。**对方不再是「另一群有自己理由的人」，而是害虫、病毒、叛徒。语言先动手，暴力随后。纳粹德国管犹太人叫「寄生虫」，卢旺达电台管图西族叫「蟑螂」——大屠杀的宣传准备里，词汇改造永远是第一步。

大白话

大白话：滑坡的本质是「情感换挡」——从「我为我们自豪」（对内做功）滑到「我恨他们」（对外做功）。对内做功的情感烧得很干净：盖房子、办学校、守堤坝。对外做功的情感必须不断找敌人当燃料，烧完一个找下一个。

为什么聪明人也会滑下去

需要强调一个让所有人都不舒服的事实：这些实验的被试全是普通人，罗伯斯洞穴的孩子还是筛选过的「正常孩子」。滑坡不需要坏人，只需要**情境**。社会心理学的半世纪研究反复指向同一个结论：把人放进「我们 vs 他们 + 资源竞争 + 权威默许」的情境里，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会滑，以为自己不会滑的人滑得最快——因为他不设防。

这不是绝望的消息，恰恰是它指出了问题该在哪解决：**别考验人性，设计情境**。德国的选择（第五章）是制度性拆除「比较—免责」两级台阶；瑞士（第九章）是拆除「谁的国家」这个火药桶；卡佩尼克案背后美国宪法的逻辑（第三章）是守住「忠诚审查」这道门不许关死。所有成功的防火设计，都是承认「谁都可能滑」之后建的栏杆，而不是宣称「我们民族素质高不会滑」。

一份自检清单

这本书不给立场，但可以给工具。下次在任何舆论场（包括自己脑子里）遇到爱国话题，用这五条自检——它们对应滑坡的五级：

- 我的快乐来自「我们变好」，还是「他们倒霉」？
- 我对同一行为的评价，会不会因为行为者换了国籍而反转？
- 我所在的群体里，说「我们这次错了」的成本高不高？
- 我是否开始觉得「不表态的人」可疑？
- 我使用的词汇里，对方还是「人」吗？

五条里中了两条以上，不管站的是哪一边，都该往后退一步——塔吉菲尔的男孩们提醒我们：滑坡对所有人开放，门票只要一支笔。

最后一章，把镜头拉到最大：当人类第一次面对真正跨国界的存亡问题，这套以国界为边界的情感系统，还够用吗？

第十二章·地球村时代，还要不要爱国

一根拔河绳的启示

回到罗伯斯洞穴那辆陷住的卡车。二十二个两周前还恨不得用石头互砸的男孩，攥着同一根绳子把车拉了出来——那根绳子前一天还是他们互相仇恨的拔河道具。绳子没变，变的是问题的尺寸：当问题大到一组人解决不了，「我们」的边界就自动放宽了。

心理学家把这类问题叫超级目标——大白话：大到谁都无法独吞、必须联手的目标。它是已知的、化解群体敌意最有效的装置。这一章要讨论的是一个令全体人类不安的可能性：二十一世纪的真问题——气候变化、疫情、核扩散、AI 安全——全是超级目标的尺寸，而我们手里的情感工具——爱国主义——是为一国一地打造的。工具的尺寸配不上问题的尺寸，会发生什么？

地球村的三次压力测试

这个尺寸错配已经不是理论推演，它有三次实测记录：

气候。大气层不收护照。一个国家减碳，收益全球分摊，成本自己全担——这是经典的「公地困境」，而爱国情感的逻辑是「先管好自己的国家」。巴黎协定签了快十年，全球排放量还在涨。每个国家的选民都在用爱国主义的计算器算账：凭什么我们先减？注意这个算式本身没错——它是国家尺度情感的自然运算结果，而问题恰恰在于，这个尺度不对了。

疫情。2020 年初的口罩争夺战是个迷你实验：各国截留过境的医疗物资，德国扣过运往瑞士的口罩，美国被指「半路加价截胡」法国订的货。病毒用三个月证明了自己不认国界，而人类的应对系统用同样三个月证明了自己只认国界。后来疫苗分配重演一遍：富国抢够了几倍人口的剂量，穷国排队。「疫苗民族主义」这个词被造出来，本身就是诊断书。

AI。最新的一个。当各国把前沿 AI 当作国力竞争的核心资产，「我们绝不能落后」的爱国算式就会压倒「我们是不是都该慢一点」的安全算式。第十一章的五级滑坡正在这个新赛道上重演第一级和第二级。而这次的风险不是某一国的——是所有人的。

大白话：人类的情感系统是为了「我们的部落对你们的部落」设计的，而现在的头号问题是「我们所有人对一个问题」。这就像拿着家用的菜刀去砍一棵树——不是菜刀不好，是尺寸错了。

那爱国还要不要？

看到这里，一个顺理成章的想法是：既然国界情感成了障碍，那就废弃它，全体升级成世界公民。第十章已经否决过这条路——「人类」这个共同体没有学校、军队、纪念馆，没有那三台制造机器，它在情感上是空心的。更实际的问题是：**很多好事恰恰是靠爱国情感干成的。**

福利国家是个例子。北欧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底层动力是「我们愿意为自己的同胞多掏钱」——研究表明，社会信任越高、共同体认同越强，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越好。危机动员也是：地震洪水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那股劲，就是第一章说的护短本能在做好事。把爱国主义整个拆了，这些好事的发动机也就拆了。

所以答案不是「要不要」，而是「怎么用」。二十世纪中叶的哲学家们其实给过一个相当成熟的方案，它来自一个古老的意象：斯多葛学派想象的同心圆——每个人的内心是一圈一圈的：**最里圈是自己，然后家人、朋友、邻里、城市、国家、人类。**爱不是单选题。问题从来不是「爱国家还是爱人类」，而是各圈的分寸：里圈的爱不给你伤害外圈的许可证，外圈的责任也不取消你对里圈的义务。

把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分开

现在可以把全书拆过的零件重新装起来了。

第一章发现爱国是三层结构：古老的护短本能（操作系统）、现代的梦想技术（应用层）、私人记忆（数据）。十一章走下来，各国所有的分歧、事故和成功经验，都可以用这个框架解释：操作系统大家一样，装的应用不同——美国装了「宪法信仰」，法国装了「学校锻造」，德国烧伤后换了「宪法爱国主义」还装了漏电保护器，日本把应用放进柜子，中国在三千年「家国」的底层上跑现代系统，小国跑高压模式，散装国家考验系统架构。

而展望二十一世纪，最可能的答案是：**操作系统换不了（也不该换），应用要升级**。升级的方向在罗伯斯洞穴的第三周已经演示过了：制造超级目标，让「我们」的边界随着问题的尺寸扩大。欧盟是一个粗糙的尝试——战火最频密的大陆，把煤炭钢铁（战争的原料）放进共同管理，七十年没再互相打仗。它毛病缠身，但它证明了认同的边界可以被工程性地放宽：今天的法国年轻人和德国年轻人互相把对方当「自己人」的程度，是他们的曾祖父无法想象的。

最后，回到那个解说员

这本书从一个为意大利队嘶吼的中国解说员开始。现在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了：那种心跳是真的，它来自几十万年的人类生存史；它指向的对象是几百年内被发明、被教育、被仪式反复浇灌的共同体；它可以驱动人盖房子也可以驱动人烧房子，取决于它被装进什么制度、滑到第几级台阶、烧的是对内的功还是对外的火。

各国有各国的答案，但穿过所有差异，有一条线索反复出现：**健康的爱国，爱的对象足够具体（具体的街道、具体的人、具体的约定），而恨的对象足够抽象直至消失；危险的爱国恰好相反——爱的对象越来越抽象（抽象到只剩一个不容讨论的词），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具体到邻居的车、同事的表态、街对面那家人）。**

爱一个地方，不需要恨另一个地方。这不是道德高调，是罗伯斯洞穴的二十二个孩子用三周露营证明过的工程学结论。

至于「我要不要爱国」——这本书拒绝替你回答，那是你的私人记忆和国家之间的私事。这本书只负责把它拆开给你看。看完之后的那个情感，如果还在，它会更结实；如果变了，它会变明白。两种都是好结果。